

# 挤压当前还是保障未来： 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研究

岳经纶 尤泽锋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1997 年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广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皆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尽管养老保险覆盖面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目前学界对于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却持有两种相反的意见。本文基于 2017 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运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越强;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相比没有参保,参加养老保险无法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以上结论揭示出了中低收入阶层更加关注于养老保险的缴费而非待遇,反映了养老保险对中低收入阶层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水平造成挤压的同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保障未来养老的预期和功能。本文的发现为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应对我国老龄化危机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养老保险; 缴费水平; 待遇水平; 参保状况; 认知; 中低收入阶层; 幸福感

## 一、引言

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与发达国家同期经济增长水平相比,我国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困境<sup>①</sup>。据统计,2016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高达 1.5 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 10.8%<sup>②</sup>,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老年人口数量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的国家<sup>③</sup>。着眼于未来,204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 21.9%,正式踏入“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sup>④</sup>。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1997 年以来我国分别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并于 2014 年开始将后两者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形成了广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据统计,2016 年,我国养老保险总覆盖面已从 2010 年底的 3.6 亿人增长到 8.9 亿人(如图 1 所示),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取得了阶段性成就<sup>⑤</sup>。

尽管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学界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却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发挥了较好的保障功能<sup>⑥</sup>,因为它能够实现消费平滑、保险、减贫和再分配的作用,在老年人失去生活来源或劳动能力后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功能,给予其较高的替代率,能够较好保障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sup>⑦</sup>。而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使工薪阶层难以承担;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养老保险较大地挤压了其当前生存型消费水平,造成了近年来断保和弃保的数量不断增长,难以发挥保障的功能,相反却造成了“劫贫济富”现象的发生<sup>⑧</sup>。

那么,从实证研究来看,对于正在参保缴费的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养老保险是否能够发挥其保障未来的预期和功能,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是更倾向

收稿日期 2018-09-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政策创新与共享发展”(16JJD630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研究”(15ZDA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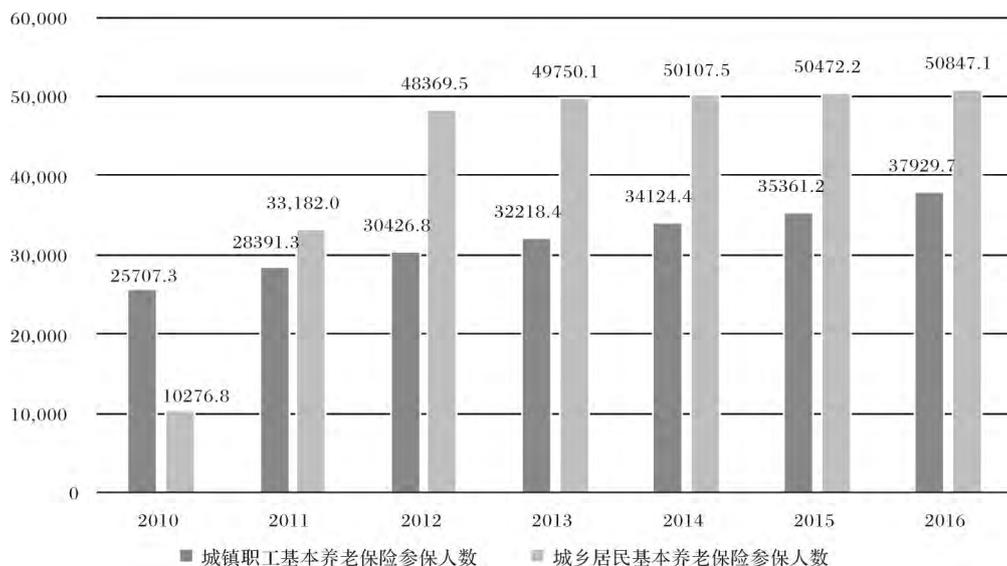


图1 2010—2016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2017

于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仍较为不足。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第一，能够为厘清目前学界有关养老保险保障功能的争议和分歧提供参考，弥补相关研究的局限；第二，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应对老龄化危机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基于2017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究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待遇水平认知以及参保状况对中低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以解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 二、相关文献回顾

幸福感，又称“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已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涉及跨区域幸福感比较、不同群体幸福感比较、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幸福感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等议题。就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而言，学界主要从微观层面的人口学特征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两个维度来进行研究。

性别、年龄、收入、就业等人口学特征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sup>①</sup>。其中，关于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学者发现年龄与幸福感呈现U型关系，即处于年轻和老年阶段的居民更幸福，而处于年龄中间阶段的居民则相对不幸福<sup>②</sup>。有关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Easterlin发现，绝对收入对于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拥有更高的幸

福感<sup>③</sup>；此后，不少学者指出，相对收入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④</sup>。学历对幸福感的影响则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源分配方式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地区，学历越高意味着能够获得的收入等经济资源越多，因而幸福感会越强<sup>⑤</sup>；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历与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因为学历越高的人对于自我期望越高，面临的压力更大，一旦遭遇与其期望不一样的情景，将导致其幸福感大幅下降；相反，学历越低的人，越容易得到满足，因而幸福感会相对较高。对于就业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Clark等通过新英国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职的人比失业的人拥有更高的精神健康水平，进而拒绝英国政府有关“因为失业可以获取政府援助，所以人们倾向于自愿失业”的假设<sup>⑥</sup>。

除了人口学特征外，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政府支出、生态环境等宏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sup>⑦</sup>。关于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Easterlin通过美国和古巴的比较提出了“Easterlin悖论”，又称“幸福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即在一国之内，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拥有更高的幸福感，但将富国与穷国进行比较，其国民幸福感则几乎无异<sup>⑧</sup>。在“幸福悖论”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通货膨胀、收入差距、生态环境等经济增长外的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发展。Arthur Okun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用以衡量人民的生活的“痛苦程度”；痛苦指数由年

度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相加组成,痛苦指数越高,表示人民的日子越糟糕。何立新发现,机会不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普遍的损害作用,因此维护机会公平、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对提高幸福感和破解“幸福悖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sup>⑦</sup>。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Welsch 通过分析 54 个国家的幸福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了收入等变量后,城市二氧化氮每增加 1 千吨,将导致国民幸福感下降 0.003 个单位<sup>⑧</sup>。

目前,学界已积累了大量上述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但有关社会保障、养老保障或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大多从以下三个角度开展:

第一,探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幸福感的没有显著的关系<sup>⑨</sup>。不少学者则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显著地提升幸福感。如 Radcliff 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了福利支出水平越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感越强<sup>⑩</sup>;鲁元平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中国部分发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物价的过快上涨、交通拥挤等是造成“幸福悖论”的重要原因,而社会保障支出等亲贫式支出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可以作为破解“幸福悖论”的工具<sup>⑪</sup>。

第二,探讨参加、享有社会保障情况与幸福感的关系。Pei 等基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CRCA)数据发现享有养老金对幸福感具有非常大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种影响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sup>⑫</sup>。Zhang 认为享有养老金能够降低老年人的焦虑和孤独感,并提升生活满意度<sup>⑬</sup>。元寿伟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城市中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和农村社会中享有合作医疗的老年人比没有享有的老年人更为幸福<sup>⑭</sup>。阳义南发现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将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 4.64%<sup>⑮</sup>。

第三,探讨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该类研究数量较少。王琼等基于 CHARLS 数据发现养老金的相对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幸福感,而养老金的绝对水平对幸福感没有影响<sup>⑯</sup>。聂建亮等指出,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金待遇的评价越高,幸福感越强<sup>⑰</sup>。Tella 发现在 1975—1991 年期间,拥有更高失业保险福利水平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国民幸福感<sup>⑱</sup>。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

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对于理解幸福感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对于养老保险和幸福感的研究仍不充分,不足以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第一,相比其他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目前有关社会保障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有关养老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则更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和是否参加或享有社会保险的角度来切入,较少关注到社会保障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三,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养老保险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而较少涉及到养老保险与非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第四,现有的养老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也过于笼统,没有具体分析养老保险对不同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随着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社会分层理论”进而被提出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当中。作为社会分层理论最早的提出者之一,马克思·韦伯指出,财产、社会声誉以及所在政党的不同造成了人们在阶级、地位和权力上的分化;社会分层则是阶级、地位和权力分化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三个因素当中,以财产为核心的阶级则是造成社会分层的根源;此外,韦伯还认为,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不同层级之间的竞争与矛盾无法避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sup>⑲</sup>。根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所占有的财产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使得一部分占有较多财产的居民成为中高收入阶层,而另一部分占有较少财产的居民则成为中低收入阶层,财产位于两者之间的居民则成为中等收入阶层。而不同收入阶层的养老需求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sup>⑳</sup>,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提高,会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对家庭消费产生抑制的效果<sup>㉑</sup>。我国中低收入阶层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sup>㉒</sup>,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缴费能力差。不少研究揭示出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缴费机制设计不合理,缴费水平过高<sup>㉓</sup>,使得中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王国辉通过建立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模型发现,养老保险缴费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缴费压力,即使是选择最低的缴费标准<sup>㉔</sup>。田玲等发现基本养老保险显著增加了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的食品、交通等生

存型消费感知压力,而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生存型消费感知压力没有影响<sup>⑤</sup>。芮玉红等指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采用的是一种累退的缴费机制:职工所处的行业的收入越低,其真实缴费负担则越高;而职工所处的行业的收入越高,其真实缴费负担则越低;因此,目前的制度设计会使得低收入行业职工的真实缴费率大于名义缴费率,进而对其产生较大的缴费负担<sup>⑥</sup>。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产生了较大的缴费压力。

与此同时,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过高,同样也给企业造成了较大的缴费压力,进而产生了较大的用工成本<sup>⑦</sup>。而缴费水平过高会影响企业的招聘意愿。朱文娟基于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率每增加1%,平均将导致总就业水平减少0.153%,城镇就业水平减少0.06%<sup>⑧</sup>。马双发现,较高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使企业将养老保险的成本转嫁给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上升1%,会使企业员工工资减少0.6%,员工福利减少0.6%,企业雇佣人数下降0.8%<sup>⑨</sup>。封进指出目前我国过高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不仅导致了企业成本的增加,还导致了企业缩减员工的福利,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或非技术类型员工的工资和福利<sup>⑩</sup>。由此可见,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过高,会直接影响企业雇佣人员的意愿和社会就业水平,进而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同时,还会使企业把缴费成本的提高转移给员工,使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进一步减少。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越强。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产生较大的缴费压力,进一步挤压了他们当前十分有限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甚至影响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生存型消费<sup>⑪</sup>,使他们本已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结果会导致大量无力承担缴费的中低收入阶层被迫中断参保<sup>⑫</sup>。尽管可以进行补缴,但补缴一方面需要缴纳高额的利息和滞纳金,且利息和滞纳金会随着断保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补缴的标准必须参照补缴之日上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即断保时间越长,补缴的缴费基数相比断保前的缴费基数越大。因此,即便是养老保险替代率较高,中低收入阶层也可能因为断保且在未未来无力补缴,导致缴费年限不满15年,进而丧失领

取养老金的资格。因此,断保且无力补缴的风险,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是否能够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无法得到保证,进而导致其对待遇水平的认知无法影响其幸福感。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基金缺口、抚养比下降、空账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2016年,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达到7个,而黑龙江省的累计结余甚至出现亏空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峻,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抚养比也在持续下降,2016年共有9个省份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跌破2:1<sup>⑬</sup>。此外,2015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规模已达到4.7万亿元,而同期的基金累计结余仅有3.5万亿元<sup>⑭</sup>。另一方面,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延迟退休、养老金入市风险等议题也存在担忧和争议<sup>⑮</sup>。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缺陷、争议使民众对未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前景和保障未来养老的功能缺乏信心,无法降低民众的储蓄率<sup>⑯</sup>。2005年有关调查显示,有35%的人相信“现在每月交养老保险,到时候肯定有保障”;但2015年该机构进行同一主题的调查却发现相信养老保险的人数呈现减少趋势:仅18.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相信缴纳养老金对以后的养老有用,19.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用,61.3%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sup>⑰</sup>。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前景的不明朗和民众对于养老保险信心的缺乏,可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对于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认知无法转换为对其未来实际上能够获得的待遇水平的认知,进而无法影响其幸福感。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养老保险一方面会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较大的缴费负担,影响其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无法呈现出明朗的前景,使其对未来的制度发展和待遇水平充满迷茫和失去信心,未能有效地发挥出保障未来养老的预期和功能。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

#### 四、数据来源、变量操作化与描述性分析

##### (一)数据来源

为全面了解公众福利态度,精确识别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于2017年期间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共6596位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此次调查以地级行政区为抽样单位,平均每个地级行政区随机抽取样本314个。调查内容涵盖人民对当年的收入不平等、贫困、社会支出、社会团结与社会风险、税收、工作伦理、公平原则、幸福感、社会照顾等方面的认知和态度。

## (二) 变量操作化

1. 中低收入阶层。本次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认为您的家庭属于哪个阶层”来测量受访者所处的收入阶层。受访者所处的收入阶层为“低收入阶层”赋值为1,为“中低收入阶层”赋值为2,为“中等收入阶层”赋值为3,为“中高收入阶层”赋值为4,为“高收入阶层”赋值为5。为了筛选出没有退休的样本,本文删除了“已退休”的样本,保留没有退休的样本。然后,本文把“低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合并为“中低收入阶层”,把未退休的中低收入阶层作为研究对象。据本次调查显示,在6596个有效样本中,3183个样本为未退休的中低收入阶层,占比为48.3%。

2.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本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幸福吗?”。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非常不幸福”赋值为1,“比较不幸福”赋值为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赋值为3,“比较幸福”赋值为4,“非常幸福”赋值为5。如图2所示,本次调查显示,在未退休的中低收入阶层中,有49.0%的人感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有40.8%的人生活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有10.1%的人感到比较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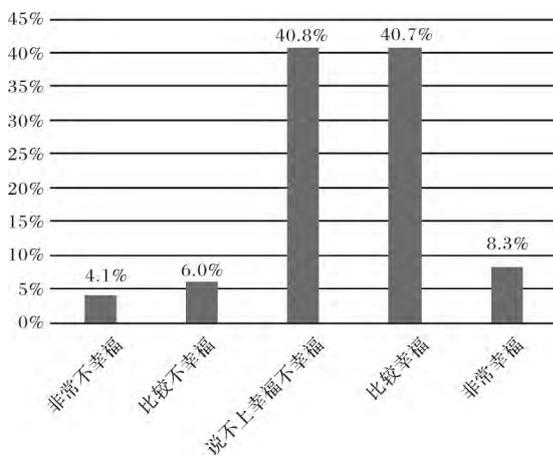


图2 中低收入阶层主观幸福感的频率统计

3. 解释变量:包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待遇水平认知和参保状况。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1) 养老保险参保状况。本次调查询问了受访者“请问您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该问题能够测量出中低收入阶层是否参加了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用1表示参加了养老保险,用0表示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2)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本次调查在询问“请问您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基础上,询问回答了“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您认为当地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合适吗”。认为缴费水平“太低”赋值为1,“有点低”赋值为2,“刚刚好”赋值为3,“有点高”赋值为4,“太高”赋值为5。

(3)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本次调查在询问“请问您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基础上,询问回答了“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您认为当地的养老待遇水平合适吗”。认为养老待遇水平“太低”赋值为1,“有点低”赋值为2,“刚刚好”赋值为3,“有点高”赋值为4,“太高”赋值为5。

4. 控制变量:由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具有不同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故把养老保险的参保类型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把地区、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收入水平等基本的人口学特征纳入控制变量。

## (三) 描述性统计

表1详细描述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取值情况,包括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取值范围等。

## 五、统计模型和分析结果

对于主观幸福感,国内外学者一般倾向于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取代普通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sup>⑧</sup>。遵循前人研究的范式,本文选择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Y_{is} = \alpha + \beta X_{is} + \gamma Z_{is} + \epsilon_{is}$$

其中,下标s表示地级市,而下标is则表示在地级市s居住的个体i的个人特征变量;Y<sub>is</sub>为被解释变量,X<sub>is</sub>为解释变量,Z<sub>is</sub>为控制变量,ε<sub>is</sub>为随机误差项;α、β、γ分别为待估参数。

如表2所示,模型(1)表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显著度为0.05。模型(3)表明在控制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依然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度为0.05。这说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越强,假设1得到验证。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缴费

表 1 各变量取值情况

变量名	参照组	观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b>被解释变量</b>						
幸福感		3145	1	5	3.432	0.882
<b>解释变量</b>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		1569	1	5	3.359	1.153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		1487	1	5	2.230	0.948
参加养老保险	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3167	0	1	0.630	0.483
<b>控制变量</b>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650	0	1	0.593	0.491
珠三角地区		3183	0	1	0.427	0.495
男性	女性	3183	0	1	0.616	0.486
年龄		2953	18	80	33.652	10.929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3095	0	1	0.394	0.489
本市户口	非本市户口	3160	0	1	0.663	0.473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3110	0	1	0.077	0.266
教育程度		3155	1	7	4.057	1.248
有配偶	无配偶	3143	0	1	0.598	0.490
在职	非在职	3183	0	1	0.648	0.478
收入水平		2758	1	10	3.963	1.850

能力差、基本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中低收入阶层最为关切的是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总体而言,参加养老保险会对其当前的食品、交通、住房、医疗等生存型消费水平产生较大的挤压效应,使其本已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因此,在参保的情况下,中低收入阶层对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高,反映了养老保险对其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的挤压程度就越大,其幸福感就越低。相反,中低收入阶层对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反映了养老保险对其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的挤压程度就越小,其幸福感就越高。与此同时,缴费水平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密切相关。目前较高的缴费水平对企业产生较大的压力,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减少企业的招聘意愿,并且还会使企业把相关的成本转移给员工,削减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以弥补养老保险缴费成本的增加,这会造成以灵活就业为主、工资水平偏低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被进一步挤压和削减,进而影响其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缴费水平越高,中低收入阶层寻找工作的机会就越少,并且能够获得的当前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也会越低,因而其当前的基本生活越不能得到保障,幸福感也就越低。相反,缴费水平越低,中低收入阶层寻找工作的机会就越多,并且能够获得的工资和福

利水平也会越高,因而其当前的基本生活越能够得到保障,幸福感也就越高。

表 2 养老保险对中低收入阶层幸福感影响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

模型	(1)	(2)	(3)	(4)
参加养老保险				-0.032 (0.049)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	-0.063** (0.028)		-0.060** (0.030)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		-0.001 (0.034)	-0.010 (0.036)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0.108 (0.076)	-0.131* (0.077)	-0.153* (0.080)	
珠三角地区	-0.009 (0.071)	-0.019 (0.072)	0.009 (0.075)	-0.057 (0.050)
男性	-0.116* (0.068)	-0.137** (0.069)	-0.100 (0.072)	-0.148*** (0.047)
年龄	-0.064*** (0.021)	-0.069*** (0.021)	-0.073*** (0.022)	-0.038*** (0.014)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03)	0.001*** (0.0003)	0.001*** (0.0003)	0.0003** (0.0002)
非农业户口	0.015 (0.070)	-0.009 (0.072)	0.007 (0.074)	0.043 (0.048)
本市户口	0.167** (0.078)	0.114 (0.081)	0.139* (0.083)	-0.003 (0.051)
中共党员	0.502*** (0.115)	0.468*** (0.113)	0.463*** (0.119)	0.438*** (0.087)

续表

模型	(1)	(2)	(3)	(4)
教育程度	0.045 (0.032)	0.049 (0.033)	0.044 (0.034)	0.051** (0.022)
有配偶	0.145* (0.085)	0.147* (0.087)	0.140 (0.089)	0.178*** (0.058)
在职	0.041 (0.084)	0.010 (0.085)	0.041 (0.088)	-0.040 (0.053)
收入水平	0.044** (0.021)	0.047** (0.021)	0.047** (0.022)	0.024* (0.014)
Log likelihood	-1375.510	-1327.2604	-1229.891	-2906.693
LR chi2	70.10	57.58	58.11	91.85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25	0.021	0.023	0.016
观测值	1177	1129	1052	2406

注：(1)\*、\*\*、\*\*\* 分别表示  $p < 0.1$ 、 $p < 0.05$ 、 $p < 0.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2)表明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3)表明在控制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依然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一方面,目前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会使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存在断保且无力补缴的风险。这将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是否能够获得养老金待遇成为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其对待遇水平认知无法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另一方面,目前养老保险的基金缺口、空账和城乡居民养老金调整机制滞后等问题和缺陷,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延迟退休、养老金入市风险、城镇职工养老金增长率放缓等议题的担忧和争议,使得中低收入阶层对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前景和其未来实际上能够获得的待遇和保障水平充满迷茫和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中低收入阶层对于当前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认知无法转换为对其未来实际能够获得的待遇和保障水平的认知,进而无法影响其幸福感。

模型(4)表明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相比没有参保,参加养老保险无法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假设3得到验证。根据上述逻辑,养老保险会对中低收入阶层当前基本生活水平造成挤压的同时,却无法呈现出一个明朗的发展前景,无法发挥保障其未来退休后生活水平的预期和功能。因

此,总体而言,相比没有参保,参加养老保险实际上无法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

## 六、总结与讨论

面对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的现状,1997年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广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皆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尽管养老保险覆盖面得到迅速提升,但目前学界有关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这一议题存在着争议。因此,本文探究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待遇水平认知和参保状况与中低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系,以试图对这一争议进行解答。本文的发现如下:

第一,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越强。

第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

第三,相比没有参保,参加养老保险无法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

结论一和结论二充分说明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注意力更多的在于缴费水平对其当前生活的影响,而更少地在于待遇水平对其当前生活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出,养老保险会对中低收入阶层和企业产生较大的缴费负担,挤压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水平;同时,断保且无力补缴的风险、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问题以及社会各界的担忧和争议使得养老保险未能给予中低收入阶层一个良好的前景、预期和信心,使其对于待遇水平的认知无法转换为对其未来实际上能够获得的待遇和保障水平的认知,进而无法缓解其对于养老的担忧。因此,总体而言,养老保险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更多的是对当前基本生活水平的挤压,而在挤压的同时却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保障未来的预期和功能。结论三进一步为上述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养老保险与已退休并领取待遇的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且倾向于认为养老保险能够发挥较好的保障功能,提升其幸福感<sup>④</sup>。此外,还有的研究关注养老保险与所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的关系,并且也倾向于认为养老保险能够提升其幸福感<sup>⑤</sup>。而本文则探究养老保险与正在参保缴费的中低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了养老保险未能发挥保障未来的预期和功能,无法提升其幸福感。这说明了养老保险对不同的群体所产生的保障效果和幸福效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具体

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更加谨慎的结论。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见,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而本文的结论揭示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保障中低收入阶层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这说明,在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同时,还必须继续不断地巩固和完善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了更好地发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功能和幸福效应,对目前不合理的缴费基数进行更加科学地调整和适度降低,同时对困难家庭的养老保险缴费进行减免、补贴以及建立贷款机制,将有利于化解缴费支出对其基本生活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及断保和无力补缴的风险。与此同时,通过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断完善养老保险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保持养老保险体系规范和平稳运行,加大养老保险制度正面形象的宣传力度,能够重振中低收入阶层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从而更好地发挥保障未来养老的预期和功能,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中低收入阶层的美好生活。

#### 注释

① 郭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indexch.htm。

③ 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2016年5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8/content\_5077706.htm。

④ 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人社部:《我国社会保险事业改革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7年5月25日,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shzb/dongtaixinwen/buneyaowen/201705/t20170525\_271399.html。

⑥ Pei, X., and V. K. Pillai.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49, no. 3 (1999): 197-212; Zhang, W., and G. Liu. “Childlessnes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2, no. 2 (2007): 185; 刘瑜:《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年第8期。

⑦ Barr, N., and P. A. Diamond. *Pension Reform: A Short Gu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⑧ 王国辉、黄镜伊、王利军、王小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研究》,《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 万磊、石玉建、魏栋鸿、谢助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评估》,《中国社会保障》2014年第6期。

⑨ Blanchflower, D. G., and A. J. Oswald. “Well-being,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Job Satisfa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Deeming, C. “Addressing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Latest Challenge for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2, no. 3 (2013): 541-565.

⑩ Blanchflower, D. G., and A. J. Oswald. “Well-being,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Job Satisfa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⑪⑫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1974: 89-125.

⑬ Easterlin, Richard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7, no. 1 (1995): 35-47; Ferrer-I Carbonell, Ada.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no. 5 (2005): 997-1019;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⑭ Frey, Bruno S., and A. Stutzer. “Measuring Preferences by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5, no. 4 (1999): 755-778.

⑮ Clark, Andrew E., and A. J. 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104, no. 424 (1994): 648-659.

⑯ Tella, Rafael Di, R. J. Macculloch, and A. J. Oswald.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85, no. 4 (2003): 809-827.

⑰ 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

⑱ Welsch, Heinz. “Preferences over Prosperity and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Based on Happiness Surveys.” *Kyklos* 55, no. 4 (2010): 473-494.

⑲ Veenhoven, Ruut.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evel not Higher, 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 no. 1 (2000): 91-125; Ouweneel, Piet. “Social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Unemployed in 42 Na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 no. 2 (2002): 167-192.

⑳ Radcliff, Benjamin. "Politics, Mark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Happi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no. 4(2001): 939-952.

㉑ 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0年第11期。

㉒ Pei, X., and V. K. Pillai.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49, no. 3 (1999): 197-212.

㉓ Zhang, W., and G. Liu. "Childlessnes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2, no. 2 (2007): 185.

㉔ 元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㉕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年第8期。

㉖ 王琼、曾国安:《退休及养老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经验分析》,《保险研究》2015年第11期。

㉗ 聂建亮、苗倩:《需求满足、政策认知与待遇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㉘ Tella, Rafael Di, R. J. Macculloch, and A. J. Oswald.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no. 1(2001): 335-341.

㉙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08-127页。

㉚ 李若建:《不同职业背景老年人生活及养老模式的选择》,《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

㉛ 白重恩、吴斌珍、金烨:《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席卫群:《社会保险缴款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吗?》,《学海》2012年第2期。

㉜㉝ 王国辉、黄镜伊、王利军、王小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研究》,《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

㉞ 封进:《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视角》,《金融研究》2014年第7期;高奥、谭娅、龚六堂:《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与收入不平等》,《世界经济》2016年第1期。

㉟ 田玲、刘章艳:《基本养老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消费压力感知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1期。

㊱ 芮玉红、申曙光、彭浩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研究——基于广东省行业视角的分析》,《学

术研究》2010年第10期;康书隆、余海跃、王志强:《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基于借贷约束视角的分析》,《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

㊲ 王增文、邓大松:《基金缺口、缴费比率与财政负担能力:基于对社会保障主体的缴费能力研究》,《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0期。

㊳ 朱文娟、汪小勤、吕志明:《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期。

㊴ 马双、孟宪芮、甘犁:《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2期。

㊵ 封进:《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视角》,《金融研究》2014年第7期。

㊶ 王国辉、黄镜伊、王利军、王小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研究》,《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李珍:《养老保险“断保”的制度性原因》,《社会科学报》2013年第4版。

㊷ 中国网:《2016年社保发展年度报告发布:养老金收支压力凸显》,2017年11月28日,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1/28/content\\_41951762.htm](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1/28/content_41951762.htm)。

㊸ 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第82-85页。

㊹ 李绍光:《养老金基金的投资及管理——国内理论探讨与实践综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Lucas, D. "Investing Public Pensions in the Stock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Risk Sharing, Capital Form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 no. 3(2010): 179-202;乐章、刘二鹏:《延迟退休年龄:研究进展与若干争议》,《社会保障研究》2015年第2期;张春侠:《养老金入市引争议》,《中国报道》2015年第8期。

㊺ 杨继军、张二震:《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㊻ 向楠:《比空账更可怕的是青年对养老保险失去信心》,《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8日第7版。

㊼ Clark, Andrew E., and A. J. 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104, no. 424 (1994): 648-659; Frey, Bruno S., and A. Stutzer. "Measuring Preferences by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5, no. 4 (1999): 755-778; Alesina, A., R. D. Tella, and R.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no. 9(2001): 2009-2042;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㊽ Pei, X., and V. K. Pillai.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49, no. 3 (1999): 197-212; Zhang, W., and G. Liu. "Childlessnes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2, no. 2(2007):185; 聂建亮、苗倩:《需求满足、政策认知与待遇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⑤ 刘瑜:《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

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年第8期。

责任编辑 王敬尧

## **Squeezing Present or Protecting Future :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on Happiness of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Yue Jinglun     You Zefe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 In order to tackl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China has gradually built up a basic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which aims at protecting the basic life of the elderly after their retirement. Although the coverage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current researches hold two opposite arguments on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public welfare attitud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7, this research uses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of the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ayment and treatment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erception of payment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happiness of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while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nd happiness of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Moreover, compared with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who doesn't join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joining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cannot increase happiness of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ayment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rather than the treatment of it, indicating joining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will reduce the quality of life, job opportunity and salary of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but fail to play its role in ensuring their pension at the same time. Our research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s well as hav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ackling aging crisis and realizing better life.

**Key words :**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 payment ; treatment ; membership of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 perception ; low and moderate-income group ; happiness